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当代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丛书

当代俄罗斯精英与 社会转型

李雅君 张昊琦○主编

CONTEMPORARY
RUSSIAN ELITES AND
SOCIAL TRANS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当代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丛书

当代俄罗斯精英与 社会转型

CONTEMPORARY RUSSIAN ELITES
AND SOCIAL TRANSITION

李雅君 张昊琦◎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 李雅君, 张昊琦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当代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6804 - 4

I. ①当… II. ①李… ②张… III. ①政治人物 - 人物研究 -
俄罗斯 - 现代 IV. ①K835. 12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3137 号



主 编 / 李雅君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804 - 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编简介

李雅君 1964 年生于北京。198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1995 年获得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等。主要作品有《俄罗斯之痛——车臣问题探源》（专著）、《俄罗斯议会》（合著）、《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合著）等。

张昊琦 1969 年生，湖南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政治、俄国政治思想史和中俄关系史。著有《俄罗斯帝国思想初探》，参与合著有《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政治卷）》《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最高权力的组合》等。

前 言

本书探讨的是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社会转型”的概念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它主要是指社会因内力或外力的作用而发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也被称为“社会变迁”，即一个国家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人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过程，因而社会转型的过程即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苏联剧变乃至解体，以及伴随而来的原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大转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发展格局，同时它也被看作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始于南欧、拉美等国家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引起世人的瞩目。人们发现，在这些实行社会转型的国家，其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大多是由社会上层，即精英们来主导的。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与行为。因而，社会转型国家中精英的角色问题也成为当今政治学研究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20 余年社会转型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制度设计上的博弈和互动，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与东欧等国家的转型进程相比，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具有更为复杂的特性。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社会改革，在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第一次引入了公开竞争和差额选举的干部任用制度，打破了苏联社会长期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精英上升渠道，同时也开启了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序幕。在苏联解体与建立新俄罗斯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迅速完成了



由一党制的苏维埃体制向多党制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由所有制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多元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由苏联境内的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联盟共和国）向一个独立国家的转变，而这些转变都是在上层政治精英的积极推动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激进变革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这一特点也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即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按照新的精英生成方式转变为“新一代”俄罗斯精英，包括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

“新一代”俄罗斯精英的组成结构、价值趋向与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虽然以叶利钦为首的政治精英在俄罗斯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但超级总统制的确立却为执政者施展个人权威提供了政治条件，从而促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又重新回归到威权主义。尤其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他通过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各种有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以其个人集权为核心的新型权力结构，其实质就是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在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前，依靠他的精心设计，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权力配置——“梅普组合”，最终促成普京再次回归国家最高权力。

对俄罗斯精英发展进程与典型特征的考察与分析，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今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也可以在体制变革与国家治理方面，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转型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由于精英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显示出的独特作用，近年来各国研究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学者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问题都给予极大关注。而西方学者对俄罗斯（苏联）精英的研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出现冷战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精英在苏联政治系统中的生成、演变、流通、作用及其地位等。苏联解体后，对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转型时期精英问题的研究依然是美国等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他们从考察俄罗斯精英阶层的历史演进，到分析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方式、流动渠道以及功能模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

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精英

问题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俄罗斯学者借鉴并吸收了西方传统的与当代的精英理论及研究方法，陆续出版了数十部精英研究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同时还创办了专门研究精英问题的相关刊物，出现了一大批精英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①

相比较而言，目前在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领域将当代俄罗斯精英作为专门研究的著述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书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以俄罗斯精英——政治行为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当代精英理论及转型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详细考察当代俄罗斯精英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影响和相互博弈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当代俄罗斯精英的一般特征。

本书在结构和写作上采取了“先总后分”的方式。首先详细介绍了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及近年来在俄罗斯学术界形成的“精英学”的主要内容，同时对当代俄罗斯精英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和梳理，然后按照其功能和特点将当代俄罗斯精英划分为政治精英、地方精英和经济精英，并以历史脉络为出发点，运用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俄罗斯各类精英的形成过程、组成方式、类型特点等进行归纳和总结。针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俄罗斯的官僚体制”以及“结构性政治腐败”等问题，我们在相关章节的论述中也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为人们深入理解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殊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精英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用专门的一章分析并探讨了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动员型发展模式”“服务型精英”与“帝国意识”等精英政治传统的主要内容与特点，以及这些政治传统对当代俄罗斯精英的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和深刻影响。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为当代俄罗斯“精英政治”的典型实例，我们将 2008~2012 年间俄罗斯政治中出现的从“梅普组合”到“普梅组合”的模式转换作为观察点，对“梅普组合”与“普梅组合”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进行梳理与回顾，形象地展现出当今俄罗斯“精英政治”的内涵与政治精英内

^① 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精英问题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相关内容。



部关系的特点。

《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参加本书研究和写作的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多年从事俄罗斯政治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学者。全书的基本框架设计由李雅君和张昊琦负责完成。各章的具体写作情况如下：

导 论	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张昊琦 李雅君
第一章	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与俄罗斯的“精英学”	李雅君 张昊琦
第二章	俄罗斯的精英传统	张昊琦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精英的演化	李雅君
第四章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庞大鹏
第五章	当代俄罗斯的地方精英	崔皓旭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的经济精英	郝 赫
第七章	当代俄罗斯的“精英政治”	李雅君

各章初稿完成后，由李雅君对全书做了部分修改和增补，包括最后的统稿和参考文献的整理工作。

尽管我们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精力，但由于研究水平所限，很多方面还研究得不够深入。其中，由于缺少相关的研究资料，我们没有在本书中对当代俄罗斯精英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俄罗斯文化精英进行专门的研究，实属遗憾。而所有这些遗憾和不足也只能留待本书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去完成和弥补。至于研究和写作中存在的疏漏和不当之处，还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李雅君 张昊琦

2014年9月30日

目 录

← CONTENTS

导 论 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1
一 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3
二 转型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特点.....	7
三 精英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15
 第一章 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与俄罗斯的“精英学”	19
一 精英理论的一般概念	19
二 俄罗斯的“精英学”	28
 第二章 俄罗斯的精英传统	43
一 国家发展道路与精英的形成模式	43
二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历史更替	47
三 俄罗斯精英传统的特点	58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精英的演化	62
一 苏联后期“党 – 国精英”的内部分化	63
二 社会转型与精英的多元化	75
 第四章 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88
一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形成	88



二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类型	93
三 俄罗斯政治精英与国家官僚体系	106
第五章 当代俄罗斯的地方精英	112
一 俄罗斯地方精英的形成与地位变迁	112
二 俄罗斯地方精英的构成	121
三 俄罗斯治理地方精英的策略和手段	126
四 俄罗斯地方精英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128
五 俄罗斯地方精英的未来发展	131
第六章 当代俄罗斯的经济精英	134
一 俄罗斯经济精英的形成	134
二 叶利钦时期的“寡头政治”	142
三 普京时期俄罗斯寡头政体的终结	157
四 俄罗斯经济精英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165
第七章 当代俄罗斯的“精英政治”	
——从“梅普组合”到“普梅组合”	175
一 “梅普组合”：一种过渡性的国家权力配置	175
二 “普梅组合”：开启“长普京时代”	188
参考文献	198
后记	214

导论 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

俄罗斯是一个专制传统浓厚的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以及政治发展中，政治精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综览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史，几乎所有的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自上而下”地推动的，且不说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即使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也不是所谓的“人民起义”导致了沙皇的逊位，君主制的命运实际上是由一个狭小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圈所决定的。^① 这似乎也印证了美国政治学者H. 拉斯维尔所说的一句话：“在所有的大型社会里，任何特定时刻的决定都是由一小撮人做出的。”^②

相对于西欧国家的“创新型”发展模式来说，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动员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模式中，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冲突的，国家需要通过强硬的政治系统来进行控制，政治精英占据着国家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服务型”机制。俄罗斯历史上的精英，从“波雅尔大贵族”到“服役贵族”，从“帝国官僚”到“苏联权贵”，都具有动员型模式下的“服务”性质。^③ 这种服务性质决定了行政精英队伍的建设以及持续不断的“清洗”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④

^① Гаман – 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 : РОССПЭН, 2006. С. 5.

^② Lasswell H. , D. Lerner and C. E. Rothwell, “The Elite Concept”, in Bachrach, 1971. p. 15.

^③ См. : Гаман – 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 : РОССПЭН, 2006.

^④ [俄] 陈泽东：《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大转型引起世人瞩目。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各种观点竞相迭出。主流的观点是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就连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苏联解体确实是对人们的巨大考验，对许多人来说是悲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替代性发展方案。”^①对于这一观点，某些政治学研究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苏联政权变迁的原动力来自个人，而不是对社会压力所做出的直接回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万不得已，它不是因为“经济危机或战争所迫而采取的行动”^②。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曾表示，如果他不进行政治改革，他到现在依然会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的体制是足够稳定的。^③顺着这样的思路，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经验研究试图证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当时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大部分“党-国精英”倾向于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特权和资产合法化并传给其子孙。他们与新兴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亲资本主义同盟”，推动了苏联政治制度的改变。正是这种来自上层精英的“革命”摧毁了苏联。^④尽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有一个事实却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虽然50%的“党-国精英”离开了自己的职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们不断地实现着代际更替，然而苏联解体20年来，俄罗斯的“政治阶级”并没有完全实现更新，“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仍然存在。^⑤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室提供的调查资料，叶利钦时期75%以上的政治精英、61%的商业精英都曾是苏联时期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⑥叶利钦

① Встреча с ведущими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и зарубежными политологами, 10 сентября 2010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8882>.

②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56页。

③ 吴恩远：《苏联解体原因综述》，《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⑤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 Захаров, 2005. С. 375.

⑥ 潘德礼、许志新主编《俄罗斯十年：政治、经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39页。

时期绝大多数的地方精英也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官僚机构，其中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任职的占到 57.4%，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职的占到 39.7%，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来自于社会的其他领域。^① 在当今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中，由苏维埃时期政治精英转变而来的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仍占据了很大比例，与通过其他渠道进入政治领域的精英相比，他们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在仕途上更为广泛的人脉关系。另一个实例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上层领导干部，而且还来自于下层的企业劳动者，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肯放弃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②。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苏联后期的很多改革行动，更多的是来自于上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精英在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显示的作用，推动了俄罗斯学界对于精英问题的研究。虽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流通以及功能模式也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的政治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考察和分析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首先离不开对于俄罗斯精英的研究。

对于俄罗斯精英的研究，需要回答这样一些主要问题：在俄罗斯社会的民主转型过程中，精英在制度设计上是如何进行博弈的？他们在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是如何互动的？执政精英们在完善与巩固民主的过程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在当前威权制度下的俄罗斯，精英本身的生成、招募、流通的模式是怎样的？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结构组成及其价值趋向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精英内部的关系如何？以及怎样看待俄罗斯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这也正是本书力图所要探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 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1974 年发生在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同时

^①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 Захаров, 2005. С. 375.

^②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 365 页。

也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股浪潮由南欧及至拉美，再到东亚，然后转至苏联及东欧地区，至今余波未尽。由于既有的各种政治文化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和结构理论都不能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解释，转型政治学由此应运而生。

在转型政治学中，精英选择理论为解释民主转型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动态模式。按照这种理论，鉴于一个国家从一种政治体系向另一种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民主转型就可以被视为不同政治行为体的博弈过程，精英们的道路选择和战略取向对社会民主转型的作用尤其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将民主的确立过程划分为预备、决定和习惯三个阶段。预备阶段往往表现为一种长期的、弥漫性的政治抗争；而在决定阶段，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少数精英就明确的政治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讨价还价；到了习惯阶段，人们则在新的规则下进行理性的政治运作，在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优越性。^① 在这三个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是决定阶段，精英在这个阶段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精英之间通过战略互动选择新的政体模式。但罗斯托也同时强调，民主转型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它“必须先于其他所有民主化问题”^②。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充满了“戏剧性和反复无常的变化”^③，而这一转型进程因苏联的解体而变得更加复杂。戈尔巴乔夫所启动的政治改革只是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前奏，他倡导“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目的并非是要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架构，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他并非希望苏联解体，而且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改革初期，苏共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出现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说的“分裂”。他们认为，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精英内部分裂出“温和派”和“强硬派”，“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不治之症’和‘混乱失序’的人”，而温和派则“越

①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2.

②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2.

③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4页。

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上的选举而使其正当化”^①。

苏共高层精英的分裂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虽然戈尔巴乔夫拥有的权力居于强硬派之上，而且社会上激进派的出现对强硬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因自由化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民族问题的重新凸显不仅打乱了民主转型的步伐，同时也使联盟中央疲于应付，并逐渐对国内的局势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动用武力恢复秩序，致使高层的强硬派策划了昙花一现的“8·19”事变。此后，联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就是否保存苏联进行了多轮的讨价还价，由于联盟中央的权威因“8·19”事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联盟中央已经无力阻止联盟的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地方领导人尤其是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的政治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将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推卸到叶利钦等人的头上。

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整个进程来看，苏联解体可视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大插曲。但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铺平道路。当叶利钦准备重新启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候，主导俄罗斯发展进程的民主派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没有达成共识，重新出现了分裂，顿时使俄罗斯政局陷入僵局，最后精英之间的政治争斗在1993年10月以武力流血的方式宣告结束。取得胜利的叶利钦一方，在俄罗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强势总统制为标志的民主制度架构，完成了罗斯托所说的民主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了习惯阶段。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典型的由政治精英们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一些政治学家将社会转型划分为“自下而上的变革”“交易型变革”“退出型变革”“撕裂型变革”和“自上而下的革命”五种模式^②，俄罗斯无疑选择了最后一种。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当时除了“自上而下”之外，别无

^① O. 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

^② 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 “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3, 1997.

其他选择，“自下而上的变革”模式意味着内战。一方面这是因为苏联的极权主义比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更严格、更僵化，可以说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国家体制”，而国内的反体制运动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具备政治基础。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虽然对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但这种不满还无法成为推进改革的正常“杠杆”，因为俄罗斯民族独具一种高度的忍耐力，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①这种历史背景对于民主的塑造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民主化能否成功，但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是急于“移植”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精英之间通过武力对抗，而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而形成新的民主秩序的过程，因此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建立了一种不成熟的民主。虽然叶利钦总统在其后的执政期间加强了与其他精英阶层的协商，并在某些问题上与后者达成了妥协，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叶利钦的权威与合法性愈来愈受到质疑，在他执政后期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选择接班人的事情上，最终提前离开了总统职位。无疑，对精英的政治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的轨迹，加深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更能具体地了解精英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恢复苏联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在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但如果仔细了解一下久加诺夫在苏联解体中的表现，也许我们就可以看清，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希望“恢复苏联”的真正政治目的是什么了。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访谈录中曾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he说道：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决定联盟命运的别洛韦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时，在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下，久加诺夫动员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投票支持别洛韦日协议。投票结果，共产党代表中只有六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余的人都投了赞成票。^②

^① 池田大作、戈尔巴乔夫：《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52~15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66~67页。

二 转型时期俄罗斯精英的特点

在精英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则衰落了”，这就是精英的“生理学定律”，^① 它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候体现得尤其充分。

精英的流动包括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意味着进入、升迁或贬黜、退出精英系统，水平流动则指在系统内发生水平迁移。由于俄罗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精英模式的变迁是结构性的，一些俄罗斯学者把国家视为一个由“政治阶级”组成的大型政治“集团公司”，将精英的流动形式简化为三种：进入（инкорпорация）、迁移（ротация）和退出（экскорпорация）。^② 在研究这三种流动方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考察其背后隐含的制度性因素及历史性因素。俄罗斯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流动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政治系统的等级制导致精英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越往上走竞争就越激烈，金字塔式的模式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俄罗斯虽然对精英的准入有着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在职位空缺的填补上没有形成公开的竞争，对候选人的要求并不明确，精英流动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另外，受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社会监督的缺乏和制度规范的缺失，目前俄罗斯精英的流动主要取决于精英集团内部的一些潜规则，甚至幕后交易。“梅普组合”的出现，以及梅普二人在公开场合大谈“几年前我们就已经定下了这种权力模式”，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种潜规则在俄罗斯精英中的真实存在。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系统，从任命制到选举制的过渡也改变了俄罗斯精英的生成方式。虽然苏联时期领导干部的产生往往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那种可控的选举只是形式上的。确定新的选举制度中决定性的一步是1988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有关苏联人民代表

^① [意]维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3~14页。

^②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 Захаров, 2005. С. 99.